

与子“同袍”：那些“秀”汉服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白靖利、彭韵佳

“我从小就被人说成异类，奶奶有时候还会叫我妖怪。”

王瑞节绛脂朱唇，广袖长裙，仿佛古装剧里的人物。她这番话，逗乐了身边的“同袍”——汉服爱好者喜欢这样互称。

“那时一看到他们，我就知道自己找到组织了。”想起初次遇到“同袍”，王瑞节开心地笑了起来。现在，她不再怕被人说成“异类”，因为身边有了越来越多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且有了组织。

“同袍”不孤

2002年，在英国读书的刘丹从网上看到汉服图片，就被深深地吸引了。5年后刘丹回国，接触到汉服的实物，才发现身边有很多人有着共同爱好。

很快，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云南省汉服协会。“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想着能给‘同袍’们提供一些帮助”。

“早些年，穿汉服还有争议，很多人会误以为我们穿的是和服、韩服甚至道袍，或说我们是唱戏的。”刘丹说，十几年前和“同袍”们走在公园里，经常会因为“奇装异服”而被保安拦住询问。

但近几年，汉服爱好者已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群体。公园景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他们束发盘髻，手执团扇，挂佩荷囊，仿若回到了大唐时代。

创办一年不到，刘丹创办的云南省汉服协会就吸引了200多人入会。目前，协会会员已达一万多人，遍布云南各大中小学以及社会群体。刘丹被会员们称为“掌门”，每次办活动，他只要在朋友圈或几十个微信群发一条消息，各路“同袍”纷纷响应，颇有武林盟主之感。

网络与社交媒体，成为当下年轻人接触汉服的主要途径。

“两年前在微博热搜上看到‘中国华服日’，好奇地点进去看了看，结果一下就入了坑。”身着一身粉色立领斜襟汉服的李卓只有15岁，说起汉服来却头头是道：“我穿的这一套属于明晚期的冰小河时期，当时的人为了保暖发明的。”

“汉服分很多类型，既有宽衫大袖，也有紧身小袖，适用于不同场合。”王瑞节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穿汉服，她觉得一点都没有影响。“我上下班都是骑电动车，穿着汉服，在风里穿梭。”

汉服圈的“簪娘热”

现在，各种汉服实体店与网店很多，以汉服制作作为主、外延产品为辅的汉服产业链已经基本形成。

但在2010年前后，国内的汉服购买渠道还不畅通。王瑞节和“同袍”们只能结伴去布料市场，找自己喜欢的布料，在懂形制的师傅指导下自己动手做。当年聚在一起剪布料的场景，是她们的美好回忆。

筱雅从事汉服设计已经5年有余。一次偶然的机会，学平面设计的她接触到了曲靖师范学院汉服社。“刚开始是公益性，帮社团做汉服，后来还挺感兴趣，就开始专职做汉服。”



▲9月13日，汉服爱好者们在展示汉服。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2016年，筱雅与朋友一起成立了汉服工作室，开了淘宝店与实体店，原创设计3000套左右，其中大部分都是自己手工制作。“‘老袍子’比较喜欢手工制作，但完全手工制作的成本太高，所以布料绣花我们会找绣花厂，制作半成品，然后再拿回来自己剪裁制作。”

在王瑞节的“同袍”中，有很多簪娘——她们喜欢制作汉服发饰、面饰、首饰等不同配饰。

走进昆明正义坊，古香古色的铺子里琳琅满目，摆满了发簪发冠、耳坠璎珞等产品。这是云南省汉服协会与正义坊合作的文化集市，专售簪娘们的手工作品。

“现在协会有54名簪娘，这些都是她们手工做的。”刘丹介绍。簪娘们在网上购买原材料，根据不同风格搭配所需，制作喜欢的配饰，再拿到文化集市上去卖。

“入坑”只有一年的李卓，已拥有20多套汉服。她告诉记者：“这都是我当簪娘后买的，全用自己赚的钱。”

李卓也会在文化集市上买“同袍”们做的发饰。“因为大家做的风格都不一样，所以很容易就看出别人做的东西了。”她笑称，“这也是相互帮忙”。

逐步变成一种日常

“当时我的父母特别反对我穿汉服。”回

忆起第一次穿汉服，李卓颇有些无奈，“当时他们就觉得现在小孩子的审美怎么这么奇怪。”

当时，在李卓父母的眼里，汉服是一种“奇装异服”。后来，拗不过女儿的执着，李卓的父母开始和她一起参加汉服协会的活动，慢慢才了解汉服。

“很多人对汉服有误解，认为汉服是汉代的服饰，其实汉服是汉族的传统服饰。”云南省汉服协会会长刘丹介绍说，“很多人是接触汉服之后才知道，原来汉族也有自己的传统服饰。”

“我从了解到汉服之后就开始了研究汉服。”还在高中的李卓平时会经常看一些关于汉服的书籍，她笑着说，“后来开始读一些历史文化的书，感觉对自己的学习帮助还是很大的。”

像李卓一样的“同袍”还有很多，汉服帮他们打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

在了解更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一些“同袍”开始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王彤影接触汉服后，也会品尝插花，弹琴抄经。这样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了正读三年级的儿子，“他现在会穿汉服和我一起出门，在家也会学着弹古琴，我们都叫他‘汉二代’。”说起儿子，王彤影满眼笑意。

开了舞蹈工作室的王瑞节，经常穿汉服到教室上课。“班里的小朋友会好奇地问东问西，我都会一一解答。”身为老师的她，经常为

孩子们普及传统文化，“有时候也会跟孩子们讲讲中国的传统节日，或放一些唐诗改编的歌曲。”

面对互联网上经常出现的汉服乱搭，刘丹和“同袍”们并不认可。

“汉服并不完全是古风。”从汉服的剪裁规制、衣领袖口到颜色搭配，都蕴含着传统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传承，在刘丹眼里，汉服的演变是中国汉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被问及是否会在意周围人异样眼光时，王彤影笑着摇头：“我们的传统服饰这么美，穿上感觉很自豪，也很坦然。”周围的“同袍”们纷纷点头。

“我们因汉服聚在一起，相互支持。”刘丹认为，汉服协会的存在与发展既是“同袍”对彼此的认同，也是大家对汉民族文化与风俗有共同的认知，是对民族性的呼唤。

除了一起穿汉服，刘丹也会和会员一起开办国学经典课，宣讲国学知识。“虽然我们只是一股小力量，但也有责任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播，营造传承传统文化的氛围。”

在刘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任重道远，需要让更多人了解，但不能停留于此。“它应该融入人们日常生活，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活的文化，一种日常。”

税务局“活字典”，累倒在了税改一线

“

年轻同事再也等不来最受人倚重信赖的“活字典”；年迈的岳母再也等不来每逢周末准时过来洗菜做饭的好女婿；战友们再也等不来“终生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好战友……

本报记者邓卫华、邢鲁文、李永锡

客厅茶几上放着一大摞材料和红蓝两色笔，材料旁是喝了一半的矿泉水和打开还没来得及泡的方便面。

2018年8月15日凌晨，连续加班多日的王俊华突发心梗，倒在了茶几旁。客厅的灯彻夜明亮，这名瘦高鲁南汉子的生命定格在56岁。

“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在平凡岗位上把工作做到了极致。”在近日举办的“王俊华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上，人们一起追忆国家税务总局菏泽市牡丹区税务局原人事教育科临时负责人王俊华的先进事迹。

税务局的“活字典”

“2018年机构改革期间，俊华同志自己加

班不说，还抢着替其他人加班。”

“父亲在单位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多得多，加班加点是常事，没有周末，更没有假期。”

……

报告会上，包括单位领导、同事、女儿等在内的宣讲团成员发言时，不约而同提到了一个词——“加班”。

菏泽市牡丹区税务局局长季建国告诉记者，王俊华的“拼命”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体现在历次税务改革中。1998年税务系统垂直化改革时，人员信息表格都是纸质版，格式也不统一，王俊华一人在打字室将所有人员信息逐一输入电脑，然后仔细校对，花了3天4夜。“当他把拷贝好的资料送到我这里时，双眼通红，脸色发黑，嘴上却一直说‘不累、不累’。”

“人事是个筐，啥都往里装。”从工资福利、人员调整、干部升迁，职工的大事小事王俊华都要管。据菏泽市税务局副局长李圣君回忆，去年牡丹区国地税合并，包括离退休人员共854人，每个同志年龄多大、哪年任职、工资多少、家住哪里，王俊华几乎都能脱口而出。

“大家常说，局里有两个数据库，一个在人事科的电脑里，一个在王俊华的脑子里。他就是这本活字典！”菏泽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副局长尹国民说。

铁打的汉子，常常铁面无私到“一根筋”。牡丹区税务局沙土分局局长王洪涛与王俊华同为退伍军人，既是同事也是好友。一次考核中，王洪涛当时所在的小留分局一项工作因客观原因没有做好，无论如何解释，王俊华还是把分给扣了，两人几乎当场绝交。但考核过后，王俊华又笑呵呵地安慰他，“工作就是工

作，一切按规矩来。朋友嘛，红完脸还是朋友。”

指望不上的顶梁柱

这位工作中的铁汉子，在父母和岳父母眼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孝子。

结婚30多年来，无论数九寒冬还是三伏酷暑，只要在菏泽，王俊华始终坚持周末去岳母家、岳父母家给人做饭。

“周末无论有事没事，他都要去单位一趟，等忙完就去市场买菜，然后去老人家里，一到家就直奔厨房。”

王俊华的妻子张桂萍说，虽然在家时间不多，但是王俊华却是一家老小的依靠。“有的时候感觉不出来，没他的时候，觉得为我们遮风挡雨的顶梁柱没了。”

对妻女而言，这个顶梁柱有时并不那么温情。兢兢业业一辈子，就置下一套86平方米的老房子；女儿从小学到高中，他没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妻子子宫肌瘤做手术，他签了字就回单位加班；承诺全家人的海南之行，直到生命的终点也没兑现……

王俊华的女儿王婧长期在一家保险公司做临时工，起早贪黑，每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有朋友暗示说，像他这样从事人事工作多年的税务干部，“照顾”一下女儿并非难事，遭到了王俊华的严词拒绝。

“父亲的做法我都理解。”王婧告诉记者，父亲虽不善言辞，但爱也深沉。她小的时候，父亲再忙也会抽空做她最爱的土豆炖牛腩；这些年，父亲一直背着她送的黑色斜挎背包，七八年都不舍得换；去年过生日时给父亲买的新自行车，他每天下班都要擦得锃亮……

王婧说：“其实父亲对家人的关爱一直在身边。他的一言一行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咱们一家人，那就是八个字：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永不褪色的“小白杨”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这是王俊华生前最爱的一首军旅歌曲。

与王俊华一起在莱阳入伍的战友柴玉福告诉记者，俊华就像歌里那棵小白杨，在他身上有永不褪色的军人气质。

王俊华前用的微信头像，一直是他17岁当兵时的照片。一日参军，终生为兵——坚守岗位职责、保守岗位秘密——这正是3年军旅生涯给他留下的烙印。王洪涛说。

王俊华的退伍军人身份，也让他来处理相关工作时如鱼得水。税务系统内时常有退伍军人咨询甚至质疑待遇问题，他始终坚持以“政策用足、感情用满”，既把政策讲清又把情理讲明。

同在牡丹区税务局工作的转业军人王吉福曾对自己的待遇有意见，前去找王俊华理论。王俊华推心置腹地劝导说：“过去我们是人民子弟兵，现在是税收岗位的干部。税改关键时期，咱们的政治觉悟应该比别人高才对。”王吉福说，王俊华一席话让他心服口服。

“民生远景千钧重，税政新程万里春。”在王俊华生前工作过的办公楼前，贴着一副对联。如同战友、同事、家人所说，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一言一行中诠释着一名基层税务官对民生远景和税政新程的万般投入。

(上接13版)

一颗传承心

“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子？”

2019年8月，第三届国之名医榜单公布，来自87个三级疾病专科的304位杰出医生入选，凌锋和赵国光、张鸿祺、焦力群、晋凤增同时“榜上有名”：一个团队竟有5位！

“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子？”凌锋一直非常重视学科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想来想去，最后我想，应该是靠文化，靠建立共同的理念，来把全科的医生、护士凝聚在一起。大家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是‘珍爱生命，担当责任’。”

为建立一支好的团队，凌锋想了不少办法。首先就是建章立制：自到宣武医院，凌锋就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全力以赴，尽善尽美”作为神经外科的科训，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为了让科训真正落实，凌锋制定了“手术预案制度”，要求全科医生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上班，一起把当天要做的手术报告一遍，包括病历简史、查体阳性体征、影像学片子、可能遇到的风险及解决方案等，研究生还要用英文报告。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

宣武医院院团委书记、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洪锐说：“这个制度曾多次被要求简化或撤销，但凌教授坚持保留下来。它像一块磨刀石，把团队中的每个人磨成了‘用心’的精英。”

经过多年努力，2012年，宣武医院神经外科进入全国首批重点临床学科行列。

凌锋眼里的“团队”，不仅局限于宣武医院，她的视野甚至突破了国界的限制。在凌锋等人的努力下，2019年9月9日至12日，由世界神经外科最高级别的学术组织，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共同举办的2019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全球特别大会在京举行，这是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自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行全球大会。

一颗攀登心

“我比较看重两个奖”

最不缺乏的是毅力，最让人兴奋的是挑战。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凌锋，向来对自己要求严格。

提起神经外科，很多人脑海里会出现“高强度”“高风险”等字眼。神经外科急重症多，若出现并发症非死即残，手术时间一般也较长，动辄七八个小时，精力和体力消耗很大。所以，很多医院的神经外科都是清一色男医生，少有女医生愿意留下。

凌锋不仅“留下”了，还走在了前面。她和她团队将手术和介入手段综合应用在脑与脊髓血管病的治疗上，至今累计治疗患者2653余例，为世界最大病例组，使该疾病的治愈好转率从原来的46%至63%提高到82.2%，获得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从医半个世纪，凌锋获奖无数。

“您最看重哪一个？”

“我比较看重两个奖，一个是10年前周光召基金会首次设立的临床医师奖，因为评审方式是按照诺贝尔奖的评审方式，没有申报、评选过程你都不知道。奖金很高，35万港币我都捐到了吴阶平基金会，供我们科的年轻医生出国留学用，已经有十几个人出去了。”凌锋说，“还有一个，是2004年全国妇联评的全国十大好女明家庭标兵户。因为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如果没有可以归宿的港湾，你会觉得很空虚。家庭是我最看重的，虽然我贡献照顾不多。”

一颗公益心

“捐的和募集的，一共8000多万”

凌锋和雷锋“很有缘”：“我的名字经常被人写成‘峰’，我纠正时都会说‘是雷锋的锋’。”

“40年前我就非常崇敬雷锋精神。”从医半个世纪，凌锋始终铭记雷锋的一句话：“自己活着就是让别人活得更美好。”

作为国内神经外科权威专家，凌锋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头衔，她是丽江孤儿学校1350多个孩子的“凌妈妈”。

和孤儿们的缘分始于偶然。20年前，凌锋接诊了一位疑似脑瘤的患者，她是当时云南丽江民族孤儿的校长。手术前，校长担心自己下不了手术台，把心里一直念念不忘的学校的300多个孤儿托付给凌锋。

后来，校长的手术很成功，返回了丽江。但凌锋还是忍不住跑到丽江孤儿学校，认养了两个孤儿——拉姆和兴凤，并开始全身心投入学校慈善救助工作，成为这些孩子的“凌妈妈”。

尽管有很多人像凌锋一样关心学校，但丽江孤儿学校的经济状况依然窘迫。2005年，学校面临解散，凌锋找到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基金会支持下成立了民族孤儿救助基金。14年来，共募集善款7000余万元。

“成立基金会，可以在公众监督下，阳光地去做一些事情。”2017年12月，凌锋和爱人一商量，卖掉了一套房子，凑齐了200万注册资金，以个人名义注册了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资助贫困家庭生活、就学、病患就医，开展扶贫公益项目。

从2005年起至今，凌锋坚持在办公室义诊——所有的诊费，直接由基金会转入丽江民族孤儿的账号。

“我出的门诊都是义诊，所有的钱都给基金会，会给捐赠者证书和发票，坚持14年了。我在私立医院手术、门诊、查房的费用也都捐了。现在，凌锋公益基金会的基金快1000万了，基金会是7000多万，捐的和募集的，一共8000多万。”凌锋说。

一颗永不停歇的心

“医生是不是也得有‘瓦尔特’？”

“人都是站在朝向死亡的履带上，向死而生。每个人都不可能长生不老，却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去尽可能多地做一些利他的事情。这样在生命终结的时候，才可以坦然地说：我此生没白活！”凌锋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后，这样感慨。

凌锋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略显特殊的表格——804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列表，其中不少县名已被盖上的红色的小脚印印章。

2017年3月，凌锋倡议组建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6月，“中国志愿医生行动”启动。迄今为止，“中国志愿医生行动”已有注册医生2100多人，涉及38个专业——表格上的“红脚印”，就代表志愿医生们的足迹，截至目前他们已与146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医院、中医院、乡村卫生院建立联系，义诊18932人次，设专家个人工作站151个。

“不是有个老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吗？一提起游击队长瓦尔特，老百姓就觉得有信对反抗法西斯。我们医生不是也得有‘瓦尔特’呢？不是非得有一支天天在行动、为人民服务的队伍，让老百姓相信你、尊重你呢？”谈起自己发起活动的初衷，凌锋这样说。

“既然我这次大难不死，那就要把我所有想做的事情都去努力完成，不给自己留任何遗憾！”“鬼门关”走一遭后，凌锋的时间抓得更紧，前行的脚步更加迅速——在和99岁的父亲、90岁的母亲一起荣获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并参加国庆观礼后，她和中国志愿医生们又马不停蹄地奔走在路上，从西藏波密、墨脱，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加纳……

凌锋把丈夫崔建军叫作“老秤砣”。退休以后，富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崔建军除了原来帮助妻子翻译书籍等工作外，更多地“卷”进了凌锋的“中国志愿医生行动”，为之出谋划策、奔波努力。

“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她工作起来充满热情和激情，有点急，我是做机关工作的，有时候得帮她稳一稳。”仝佃清深，提起风雨同舟的40余载，崔建军不禁说：“她太强了，我不得不服。”

“如果用一词来形容她，是执着，还是用心？”记者问。沉吟片刻，崔建军回答：“是‘利他’。”